

# 戰時蘇聯遊記

譯佩承孫 著諾史·美



中下暖

# 戰時蘇聯遊記

每冊定價壹百元  
· 雖外酌加郵費 ·

著者 Edgar Snow  
譯者 孫承佩  
印行者 中外出版社  
總經售人

美 Edgar Snow  
孫承佩  
中外出版社  
生活書局  
生  
活  
重慶・上海  
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四十年七月重慶初版  
民國四十年九月上海再版

## 譯者前言

美國名記者E·史諾，中國讀書界是很熟悉的。本書是史諾新著 *People on our Side* 的一部。原書共分三部，第一部談印度，第二部談蘇聯，第三部談中國。三部皆不便出版，故只能將第二部譯出，易以今名。

這是關於戰時蘇聯一個生動、深刻、有力的報告，接觸的方面很廣，前方後方各種場面都接觸到了，發掘的程度很深，蘇聯人民的意志，精神，情緒都有栩栩如生的體現，著者不但報導了蘇聯的勝利，他更完美的報導了勝利是如何爭取，如何創造的。讀過之後，我們可以深切的體會到『人民戰爭』的意義，可以深切的知道，蘇聯的勝利是勢有必至，決非偶然，決非倖致。本書最後一章，敘述了有關蘇聯的重大問題，材料豐富，論述着力，在蘇聯研究上，是最有價值的參考。

# 第一章 橫貫大草原

## 一 進入蘇聯

無論什麼人走到別的國家，他的印象差不多總是被他以前的環境和經驗所決定的。這對蘇聯尤其如此。所以對於同樣的一些問題，你如果問到那些應該懂得的人，他們的回答常常是迥乎不同，其故在此。

我從德黑蘭飛入俄羅斯的頭一天晚上，曾和兩位駐蘇聯的美國記者一道吃飯。他們的經驗差不多相同；他們對於若干基本的事實都能同意，但彼此的解釋却距離很遠，正和以前美國駐蘇聯的老記者昌伯林與杜蘭第一樣。

後來我在莫斯科有一天夜晚和一位同業擬出一個清單，開列了一個外國人到蘇聯觀察時所應具備的條件，其中包括（一）對俄羅斯歷史、地理、語言和文化的相當知識；（二）對東歐歷史文化相當知識並在這個區域居住過一些時候；（三）對於東亞歷史和語言有相當瞭解；（四）對於馬克思主義學說和東西方社會革命的歷史有所瞭解。我們從而對當時在蘇聯的記者和外交官依這尺度加以衡量，分別列等。沒有一個人夠得上具備所有這些條件。

一個在蘇聯的觀察者，除了這些積極的資格外，還應該儘可能超脫一切對付問題的消極因素：

他應該像一個好的陪審官那樣客觀。譬如說，我們不能不認為一個篤信教會有權管理人間事務的分子會研究蘇聯而不存絲毫偏見。一個人若僅僅熟悉那嚴格的英美式的政府國會制度，也不免有些缺點。這一類有限度的知識背景都不大能夠使人懂得蘇聯的方法和目的。至於種族歧視，階級偏見，天生的和事老，對於社會主義的社會之整個觀念加以仇視，這些都是正確判斷蘇聯內部力量的障礙。

我感覺我自己至少在偏見方面，當我到蘇聯時是沒有什麼掛慮的。不錯，我是在一個天主教家庭養育起來的，但是我也懂得俄羅斯正教的歷史和布爾塞維克對它所持態度的理由。長時間在中國的居住使我失去了種族或宗教的偏見；我倒頗像一個道教徒了。而且事實上我發現我在亞洲的經驗。使我對於許多別人感覺困惑或驚異的俄國事物，深能領悟。遠東正是一個實驗學校，使我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和它的影響，而在滿洲我又首先接觸到俄羅斯的文化和力量。

我們常常不能把蘇聯想像一個歐亞兩洲的大陸國，而只把它當作歐洲的一部分。它實際上是東方與西方的混合體，也是東西兩方文化歷史影響的一個綜合物，這種影響對於斯拉夫人民從若干世紀的蒙古專制與沙皇暴政下向着社會主義方面的鬥爭，起了極大的作用。在全俄羅斯，韃靼的血液都自由地流溢着，而且即使在今天的蘇維埃社會中，在社會主義的實踐的背後，的確還有着亞細亞習慣、方法和哲學的強烈情調。有許多事物，在膚淺的外國觀察者看來，以為是這裏社會主義所特有的，其實不過是斯拉夫和韃靼的交流而已。

但是如果以爲蘇聯是歐亞兩洲的大陸國，所以它的居民也就是所謂殖民地裏的歐亞混種人，那

就大錯特錯了。說來好笑，甚至在戰爭期間，有些到蘇聯參觀的人竟仍把他們看成一種殖民地人民，而採取一種家長式的傲慢態度。俄國人感覺卑屈比誰都快，他們憎惡卑屈也比誰都厲害。他們認爲自甘卑屈的人只是傻瓜罷了。

當我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初飛入蘇聯時，我不信有誰能對蘇聯人抱持家長的態度。在我看了印度、伊拉克、伊朗和北非以後，我知道英美在這塊地區的兵力太少了，決不足以抵擋納粹向裏海下部的衝擊。那時史達林格勒的戰役已然打了兩個月了，德國的右翼已深入到高加索。我們低飛到巴庫和古比雪夫。德軍已逼近巴庫了，後來據巴庫市長說，巴庫自己的大砲「救了那個城市」。如果巴庫給德軍佔領，史達林格勒不守，整個中東和印度就都成爲軸心的囊中物了。

當時外間普遍以爲史達林格勒一定守不住了。我是不同意這個看法的，而且當我聽見人們講：「不消說，我們對俄羅斯的認識完全錯了！」的時候，我深爲痛恨。我們並沒有完全錯誤。從一開頭起我就相信，希特勒侵犯蘇聯無異招致大禍，這是有文爲證的（見一九四一年七月「新共和週刊」載本人論文）。但是即在那時，旅居印度和伊朗的人們很嚴肅地勸告我，說我最好早些假道西伯利亞離開蘇聯。有些謠言說蘇聯要求和了。（實際上，最初一次具體的和議不久會被提出，但提出的不是蘇聯，而是德國。）當時同盟國的要人都認爲日本是會從東方發動新攻勢的。

我們必須記住，那個時候希特勒已然佔領的地方，幾乎相當於美國全部東方和南方各州，包括台薩斯在內，那裏的人口約達六七千萬，也就等於全部美國人口的半數。這個區域佔蘇聯整個國土十分之一，但它是全蘇聯最發達的十分之一。其中有蘇聯使用中的煤礦二分之一，生產全國鐵礦箱

和生鐵的五分之三，鋼和機器約二分之一，農產品約三分之一。全國電力半數以上和鐵道的百分之三十都已失掉。最優美的城市和最富庶省份的省會已經淪陷；列寧格勒已被封鎖，莫斯科在敵砲轟擊之下。

蘇聯那時有沒有可能以它自身的力量把德國大軍逐退，或者即使再支持些時日呢？那是兩種生活方式的一個歷史考驗。那同時也可以考驗：一個基於社會主義路線而組成起由工農領導的社會，能不能抵擋加諸它的生存的最高度的威脅。所有那些相信它不能的，預言紅軍即將崩潰的，或蘇聯內部會發生政治分裂的或經濟破產的，以為蘇聯軍民會大規模向德國投降的人們，在那時還沒有證明是完全錯誤。甚至在許多同情的旁觀者看來，也似乎這個農民的國家是不能擊敗德國陸軍的，最多它只能再給我們些時間罷了。因此之故，當我到了古比雪夫之後，聽到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洛索夫斯基肯定的語句之後，我覺到十分喜悅。他向我說：

「蘇聯人民為什麼打得這樣兇，他們何以到今天還能打下去呢？這就是美國人要知道的，是不是？我告訴你：在過去，美國人是不懂得我們的。有些人受了謊話的影響，他們不相信真實的事。這就是他們之所以對我們判斷錯誤。現在他們總算看見我們人民怎樣打仗了，並且認識到在蘇聯這裏到底是有些使他如此的事物存在。你要知道那事物是什麼東西麼？回答是：革命已在這裏創造出一種新的社會意識，這個國家的男人和女人們是有所為而戰，有所為而死，有所為而活的，而在今日情勢之下，除了有所為而戰外，別無其他！」

在那以後的六個月中間，蘇聯，隨着紅軍一天天的勝利和世界慢慢感到呼吸的輕鬆，而展露在

從黎明到黑夜，藉着月光在田野裏勞作的，和夜以繼日在工場工作的殺敵的男女老幼中間，發現出這種「新的社會意識」了。

之內，一下子便找到了答案的，而且我在現在也不自誇，說一般說來，我倒可以說，沒有一個大國像蘇聯那樣不善於處理外國記者，更甚於這樣光輝燦爛，偉大莊嚴的史詩竟沒有好好地公諸於世界。然而我東看到一些，西看到一些，日積月累，終於對蘇聯抗戰精神的「祕密」，得到了我自己的結論。這些結論在本書末尾要一一表明出來。

我應該指出，洛索夫斯基還有一句話也證明他所言非虛。在我離開古比雪夫到莫斯科之前，我曾問他，他是否以為日本會攻打西伯利亞。他遲疑了一會兒，撓撓他那和加里寧一樣的鬍子，笑了笑，很有力地說：「不，我們以為日本不會攻打。」這句話，在那一九四二年十月的慘淡時期出自一個蘇聯部長之口，是頗有分量的。

## 二、由莫斯科南行

我到莫斯科不久，就聽到史達林以國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兼最高統帥的名義，發表他那著名的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紀念日演說，當他演說時，全蘇聯都靜默着，連前線的士兵也把收音的耳機緊扣在耳朵上避免砲聲的干擾，靜靜地傾聽。在莫斯科，那些巨大的擴音機在各大廣場上震撼了一整天，使史達林那緩慢，清脆，極具信心的喬治亞音調響徹雲霄。我們坐在都會飯店裏傾聽。史達

林停了一下喝一大杯水，（接着他便道歉說，這是因為那天早晨他吃鱸白魚太多，於是全俄羅斯都鬱笑了。）播音機便發出他喝下去的聲音酷似維多利亞瀑布奔流一般。

史達林說，他已受命檢討上年十一月以來的政府和黨的全般工作，他的報告是一方面敘述「我們前線平穩地建設並組織一個強大的後方，另一方面進行防禦的和攻擊的戰事。」他描述怎樣疏散工業和勞動者，建造新的工廠，不管戰事如何，解決生產上的新需要，調度鐵路運輸等等繁重的工作。他結論說：「我國以前從未有過這樣一個強大和組織完密的後方，這是必須承認的。」

但他在演說中一大部分在於檢討前線的形勢，那在當時外邊的世界看來是非常緊迫的。他強調說，蘇聯以往的挫敗是由於沒有第二戰場，因而希特勒能夠集中在蘇聯的力量，過於重大。

他說：「據毫無懷疑餘地的真實情報，德國現在所有的二百五十六師中，在我們戰場上就不下一百七十九個師。如果在這以外我們再加上羅馬尼亞的二十二個，芬蘭的十四個師，斯洛伐克的一個師，西班牙的一個師，一共有二百四十個師之多（三百萬人以上）在我們的前線。現在大家儘可想像紅軍面前遭遇着多麼嚴重而非凡的困難，而我們所表現出的英勇精神又是多麼偉大了。」

在這樣的關頭，史達林爲了鎮定人心，爲什麼不得不說：「第二戰場遲早必將發生，，」它的<sup>(2)</sup>當時情景，千千萬萬的蘇聯人民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指望來個第二戰場，

地方，男的女的都要問英美的「諾言」爲什麼還不履行。他們可是如果他們準知道不但在一九四二年以內，或者一九四三年

的士氣會受到怎樣慘重的打擊呵！

當時有一般失敗主義者在蘇聯國內外發出議論，說：由於「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不同，盟國不會組成對敵的共同進軍。史達林斥責他們說：『事實的邏輯是勝過任何其他邏輯的』；它的確勝過意識形態。一定會有第二戰場的，『因為我們的盟國需要它，並不下於我們。』」

但是史達林從未等待英美來解救。在那同一天中，他自己作了一段諾言。他說道。「敵人感到紅軍打擊力量的日子已不在遠。我們的轉捩一定要來的！」果然，不出一個月，紅軍便開始實踐那個誓言。從列寧格勒到高加索，整個的前線都已改觀，紅軍攫住了主動，在他們自己的攻勢中阻遏了德軍。

外國記者要求了好多天要到前線去參觀，但是情報局只用史達林說到援助時所用的「遲早一兩字答覆我們。除了合衆社的沙比羅以外，誰都沒准去。這個道理始終沒弄清。不過史達林既曾對沙比羅的競爭者美聯社記者加西第作過一次書面答覆的談話，以至使加氏聲名大噪，於是特別優待沙比羅一番，也是近情近理的。最後到了十二月下半月，我們終於有些走成了，這時我們知道史達林格勒之戰業已定局——雖然過了一個月德軍纔投降。

我們坐在一節頭等臥車中，向南方的薩拉托夫出發。這樣華麗的火車除了我一度在中國看到的藍鋼車外，有好多年沒坐了。車箱裏的銅器和大鏡子以及走道上鋪的紅毯，與當年的景象並無二致。但這一列車的其餘各節車輛却完全不同了，都是些舊式的，沒有漆飾的大輪車，坐着許多穿破

舊外套的兵士和農民，帶着大皮帽，穿着長到膝蓋的毡靴。

我們幾個人覺得很寂寞，想我一位同車的俄國人談談。美聯社記者吉爾摩要去開車門，但門已關閉了。

「你們可以和我談談呀，」一位陪同招待我們的中校塔朗蔡夫向我們說。這位中校正想學英語，我正想學些俄國話。我於是把他請了過來，打開一瓶伏特加。

塔朗蔡夫今年三十二歲，沒有結婚，是烏克蘭一個工程學校的畢業生。他還在那裏研究電機學，納粹就攻擊來了，紅軍乃召他入伍。後來他的膝頭受傷。他正在養傷的時候，被調在參謀本部服務，這次特別奉命招待我們這羣外國記者在大草原上視察。

「這對於作戰的人，是不開心的事吧？」我張嘴道。

「毫不，我倒可以進修英語了，」中校說。

他給我看了看一個最新式的賴加式照相機，光圈和快慢門有自動裝置。這是我以前沒有見到過的。塔朗蔡夫告訴我，這是從一個德國軍官身上奪得的。

「那個軍官怎樣了？」

他睜大眼睛，提起手背橫擺在他的頸上作了個姿式，表示已將他打死了。

「你們對所有俘虜都如此嗎？」

「不！你不懂。這個軍官是在作戰中打死的。一個人如在被俘半小時內還不死，他就不會死。如果他落在我們前線部隊的後頭，他一定會安全的。我們對俘虜很好，很好！」

「一個俘虜如果聲明他是一個共產黨，那怎麼辦呢？你們對他加以特殊考慮嗎？」

「他們都這樣聲明。我們一捉到他們，他們就喊叫：『同志！打倒希特勒！』但是他們總是放出最後一粒子彈為止，只要我們圍着他們，他們總是如此，我們不相信他們。我們問：『你們為什麼老是射擊我們呢？他們表示驚駭了。』我們不能不射擊你們，只要我們還有彈藥。你們不懂嗎？這是命令呀！」

塔朗蔡夫用手按摩了一下他的膝蓋，作出厭惡的樣子。

我們到了古西諾夫站。天氣晴朗，空氣乾冷，只有廿度的霜。婦女勞動者在車站上裝卸着笨重的軍用品。他們喘息的熱氣衝得很高。有十多個小伙子爬上了沒有裝暖氣管的火車，每人背上都扛着三枝到六枝的步槍。

「他們是把這些東西帶到前線去的，一外交委員會派來招待我們的加扎莫科夫解釋過。『他們在這裏的工場修理好，再交付給前線的神鎗手去。這對他們是一個極大的光榮。』」

我們的火車開行在一片雪白的地土上，到處點綴着高大聳立的黑色樺木林。有許多次我們的車子讓到叉道上去，給那享有高度優先權的軍用車開過去。直到第二天傍晚，我們方抵達半亞細亞式的薩拉托夫。我們在車站外邊停滯了一個鐘頭，我就和路透社記者古里耶維契在那一列列的蒸汽火車中間踱來踱去。我們碰到了一羣紅軍士兵，我留意其中有幾個亞洲人。有一個形態上完全是個蒙古人，但皮膚很白。

我們走上去和他攀談了幾句。他解釋說，他是一個達吉斯坦人。達吉斯坦是裏海東岸一個自治

共和國，界於阿哲拜然和卡爾穆克共和國之間，我們正要到那個方向去。達吉斯坦和卡爾穆克人都和蒙古人有聯系，因為蒙古人統治這塊地區有好幾百年，直到幾世紀前俄國哥薩克人振作起來，在現在的史達林格勒城附近一次大戰中戰勝為止。但是我們這位達吉斯坦人喬吉，顯然對他的民族昔日的光榮，已不大憧憬。他二十二歲，在行伍中五年了，現在升為上士。軍隊教會了他說寫俄文和烏克蘭文；他已嘗到大時代生活的滋味，還想多嘗一點。他現在希望變成一位軍官；打回到烏克蘭去，和一位他希望還活在那裏的姑娘結婚。

「你管你自己叫做亞洲人呢？還是歐洲人？」我問他。

「我是一個亞洲人。但是我喜歡俄羅斯文化——那音樂、跳舞、戲劇。哦！」他興奮地搖搖頭說他，「那真了不起！」

「那麼你真相信他們會讓你變為一個軍官麼？」

「為什麼不會？你看我：我身體壯，這是因為我吃母親的奶，吃到七歲上。為什麼不作一個軍官呢？誰都可以做紅軍的軍官，只要他肯學習。」

喬吉告訴我們說，他正押解兩名德國軍官到莫斯科去受訊問。這是他第十四回押送俘虜了。他正要把他的證件給我們看時，他的長官高聲命令他一句話，他立刻跑到車上去了。臨跑開時，他側着身子向我們嚷道：「我們已可制止德國鬼子了，最壞的時期過去了。不用開年，我們就會回到烏克蘭去了。」

在薩拉托夫，我們在鐵路工人俱樂部飽餐一頓。第二天早晨我又享受了我生平從未用過的高價

的早餐。我們每人化了二百二十個盧布，合十八元美金。這一餐有湯，各種各樣的臘腸、冷魚、巧克力、魚醬、紅酒和伏特加酒。我們在未來的三十六小時內不會有熱食，所以我們都像俄國人一樣大吃大喝一頓。

車子繼續向南開。當天早晨我們就進入哈薩克斯坦和亞洲本部，在那駱駝走的草原上開行了一天。我們隨處都可以看見被德機炸毀的房屋，於是我第一次知道德國人的確會進犯到亞洲部分的俄國。在旁邊的鐵軌上有許多車輛滿載着大砲和各種軍器，向前方開駛。另外有些裝着鹵獲和損毀了的武器慢慢開到後方去，其中不時有些烟燻了的面孔，有的是年青的姑娘，探出窗外，好奇地睨視我們。

一般說來，你要想在一個大攻勢的後方的一條主要供應線上看到緊張的活動，這裏還是看不到的。快近黃昏時，我們在軌道旁邊看見一堆破壞的東西，原來是幾輛被炸壞了的列車。這個地方叫做巴森查克。在這裏，突然有一條東西行的鐵路從加薩克斯坦的鹽池沼澤中伸展過來。什麼地圖上都看不到有這麼一條從中亞細亞修築過來的薩拉托夫——阿斯特拉罕鐵路。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之前，德國人一定不知道這條鐵路。這是戰後完成的新鐵道，遠至烏拉爾河。

### 三 戰爭與空間

自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起，納粹衝鋒隊更番向史達林格勒攻擊。單在最初的十五天內，敵人死了十八萬，飛機損失一千三百架，紅軍屹立不搖的挺立在伏爾加河右岸，粉碎了希特勒的狂妄。

計劃。這個計劃是要沿河直下古比雪夫，喀山，高爾基城，據史達林指陳，還要和突過莫斯科以北的另一攻勢相配合。這龐大的兩支軍隊想在烏拉爾會師，希特勒企圖這樣一來割斷蘇聯歐洲部份與亞洲後方的連繫。

但是，伏爾加河的鎖鑰，烏拉爾的大門，頂住了。在史達林格勒周圍，蘇聯組織了偉大的反攻，於十一月九日開始，對納粹軍隊給予第一個重大的打擊。

反攻共分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紅軍從南北兩方深深地攻入德軍兩翼，十一月二十三日紅軍突進的兩翼在距城五十英里的地方會合，這樣就把德國人包圍起來。第二階段是佛洛內茨附近的攻勢，在史達林格勒以北發動的。紅軍立即進行第三階段，在史達林格勒之南，沿伏爾加河向曼尼邁河及頓河河曲發動攻擊。這一進攻勢必要解放高加索，并砍斷希特勒伸向巴庫的魔手。

然而，在南翼發揮威力之前，納粹發動了一次絕望的攻勢威脅史城以南紅軍的左翼。德國飛機散發傳單，保證「在聖誕節以前」解救第六軍。這樂觀是知命的。十二月中旬，紅軍攻擊阿克薩河德軍，展開了南進的攻勢。

在戰役之初，德軍就做了兩大錯誤，這已盡人皆知。他們低估了紅軍的抵抗力，不管一九四一年莫斯科之役的教訓，他們預計佔領重要據點的時間，仍在他們實際攻佔外圍防線之前數月。第二，他們大大的低估了蘇聯的後衛力量，低估了蘇聯從遙遠的初工業中心發動攻勢的能力，這些失算使他們妄想以不充分的力量完成驚人的事業。

他們為什麼做了這些錯誤呢？

「我不知道」，塔朗蔡夫說。「但我能告訴你一點。我們知道如何在草原上，在冬季裏作戰，德國人却不知道。」

我們現在和紅軍在一起，和紅軍官員一道吃早餐。以後，每天早餐，我必喝一杯伏特加酒。靠我坐着一位年青的中校軍醫，名奧西波夫。看他那樣被伏特加醺得面紅紅的，他一定是今晨乘機起飛。他的衣服上掛着紅星獎章。

「喚？我喝酒，是因為我要飛往德國後方，給幾個受傷的人行手術呀。我告訴你說，這次戰爭的重傷者的比率在增高了，大約百分之四十，過去只是百分之三十。二十天以內的輕傷，我們認為都有辦法。」

「你看到過到美國的醫療供應品嗎？」

「我們有一些。並且頂好。」

「那麼，最缺乏什麼呢？」

奧西波夫向我凝視了一會兒。他雖然喝了酒，他說的却是實情。

「醫療品的缺乏？決沒有，決沒有。我們甚麼都有，謝謝你。」

我們從農舍驅車到附近陸軍招待所，女服務員迎接我們，請我們休息。一架小留聲機已經不完整了，當吉爾摩和邁吉道夫想和招待的女郎跳舞時，突然我們發現了這是德國唱片。

「不要奇怪，」豐滿的凱雅笑着說，「德國人的禮物！」

我走下樓，橫街向列甯像走去。一個穿軍服的人走來和我攀談。他是烏克蘭的猶太人，他編輯

一種德文報紙，在前線與德國俘虜中散發。他說效果很好，拿了報紙投降的德國人受到特別待遇，千百的俘虜都握有很多的分數。

#### 四 天堂

我們坐着蘇聯的破卡車橫過禿禿的平原。很少鎮市和村落，只是偶而看見集體農場的粗糙的草舍與畜廄，忽然一條結冰的小河橫在面前，有木條搭在兩岸，而就在這臨時木橋的中央，一輛陷在泥裏的拖曳機擋住了來往的交通。司機爬在車上，拿着一個火把，想融解結了冰的水管。

不知道從那裏出來了百來個紅軍，圍起了拖曳機。一條平生見過的最長的鋼索，被造出來了。鋼索的一頭拴在車架上，五分鐘之內，兵士們把泥裏的拖曳機拖出來，又隱沒在草原裏去了。

入夜以後，我們到了伏爾加河。在這裏我們聽見砲聲隆隆，看見史達林格勒的天空被照耀的隱紅。我們從木橋上渡過，在這橋上，不斷的夜間運輸發出巨大的吼聲：載重車，卡車，貨車，雪橇，各樣都有。

夜間很晚，我們到了叫做天堂的地方。波波夫少將從早晨就等候我們，走來看我們。他穿着皮衣皮帽，飾着紅星，美麗明朗的眼睛嵌在淺黑的面孔上。

在細緻這一勝利上，波波夫少將的工作大概比任何人都多。他以後方勤務副司令的身份，負責供應與運輸，在伏爾加河結冰以前，他想盡方法運過來充分的東西，其後在伏爾加河落在德軍砲火之下時候，他想盡方法使紅軍渡河迎接並遏止敵人的進攻，發動自己的勝利的反攻。